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八一期 ——
(二〇〇二年二月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2a)

【史实辨析】全面认识文革中的“红卫兵”	陈益南
【史实辨析】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一支奇特的政治势力	陈益南
【史实辨析】文革中地方基层政权的变动情况与历史责任	陈益南
【史海钩沉】华国锋：在文革中崛起	陈益南
【研究动态】西方的文革研究	徐友渔
【研究动态】说不尽的文革和被禁锢的文革研究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导言》	宋永毅
【研究动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序	余英时
【文献资料】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	中宣部 / 新闻出版署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实辨析】

全面认识文革中的“红卫兵”

• 陈益南 •

对文革中的红卫兵问题，现在国内外许多人实际存在有不少认识上的模糊与误区，其中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文革中的红卫兵，其产生、发展、蓬勃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始终是同一批人，并始终是同一种观念与身份。

实际上，文革中的“红卫兵”旗帜虽然飘扬了几十年，但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中，“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此红卫兵非彼红卫兵。

在文革中，红卫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老”红卫兵时期，造反派红卫兵时期，所谓“反军”与“拥军”的两派红卫兵时期，红卫兵下乡退出文革时期。

现在对红卫兵问题认识常常有这样几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举动与整肃批斗迫害老师及其他文化人的暴行，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而实际上，文革初期的那些所作所为，仅仅只是后来被称之为“老红卫兵”的势力干的，而与在以后奋起“造”省委市委及学校党委的“反”的红卫兵并不相干。所谓“老红卫兵”，即是文革初期以“红五类”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原北京东城、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等组成，简称“联动”），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等，都属于这一类。而以后崛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如北京“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湖南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等），则其组织构成已不注重家庭成份，其领导层也大多是平民子弟了。

“老红卫兵”们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元月之前，便因“保爹保娘”（造反派红卫兵这样讥讽“老红卫兵”），保省委市委，充当了文革期间首批保守派，而基本被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击败而瓦解，退出了文革历史的舞台。

“老红卫兵”组织虽只表演了半年时间不到，但由于他们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二次接见的百万红卫兵，基本是“老”红卫兵）是首先提出“造反有理”口号的始作俑者，而同时又是文革初期践踏人权迫害文化人的基本力量，因而，“老红卫兵”便被远距离观察中国文革情况的外国人与虽身处文革时期但被迫或主动置身于文革风暴之外的中国人，当成了中国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唯一形像。因此，现在的各种媒体无论用何种体裁，只要一讲到红卫兵，就会将其都形容为德国法西斯希特勒青年团一样的模样，而这，恰恰是对历史真相的误解与曲解。

第二个误区则是：将红卫兵都视为造反派，以为红卫兵就都是造反派。

其实，红卫兵组织在整个文革期间的不同阶段，其构成与性质也是不相同的。

“造反有理”的口号虽说是以清华大学附中一批“老红卫兵”率先喊出，在大破“四旧”中也的确显示了一些造反派的作风，然而，“老红卫兵”组织毕竟没有真正做成造反派。就是首先给毛泽东写信的清华附中“老红卫兵”首领彭小蒙与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上“红卫兵”袖章的宋要武（原名宋彬彬，毛泽东亲自给她改名为“要武”），他们最终也都反被烙上“保守派”的历史印记而退出了红卫兵舞台。

随着“老红卫兵”们的败退出局，受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如首都三司、北航红旗、上海红革会、湖南“高司”、四川八·一五、湖北“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等红卫兵造反组织则迅速崛起，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光。

在与以“老红卫兵”组织为代表的“保守派”作斗争中，造反派红卫兵是起了举足轻重的大作用，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时，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红卫兵基本上是这股造反潮流的领头力量，这个时期政治行动的中心，常常是由造反派红卫兵集聚。但是，随着所谓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的到来，造反派红卫兵也开始了分裂。分裂为所谓“拥军派”与“反军派”。

出现这种分裂的原因与催化剂有二个方面：

（一）是工人造反派势力日趋强大，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不复存在，而且必然退居次要，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必然是将上升为第一位置，但已领略“中心”风光的部份红卫兵头头试图抗拒这种现实的转变，进而发展到与工人造反派的对立。

（二）由于军队的介入。中央让各地军队介入地方支持左派，但谁是“左派”却没有严格标准，对于已

都打着造反旗号的（那时已没有人敢自称是“保守派”了）群众组织，各地军队便只好按军人的标准（守纪律），来选择和支持一些他们认为是“左派”的造反派组织，这样，面临被选择命运的造反派队伍发生分裂便是必然了。

一般来讲，青年学生红卫兵较易得到军队的青睐，因为学生红卫兵，就意味着单纯、可靠（不会有历史问题）。故，在这场分裂中，相当多的造反派红卫兵倒向了“拥军派”阵营（如湖南“高司”，重庆大学八·一五等）。而另外一些造反派红卫兵因种种原因，使他们依然站在了工人造反派组织一起，哪怕地位已降为次要。（如湖北的“三新”即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湖南的井冈山红卫兵，高校风雷红卫兵，四川的“反到底”红卫兵等）。

所谓“反军派”，也并不就是笼统的反对军队的造反派，而一般只是反对地方军区对自己进行压制的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后来一般与奉中央命令支持造反派的野战军部队结成了联盟。实际上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不论有没有中央明确指示，各地军队也大都分为了两派，而这派别的性质就是介入地方支持造反派运动之后，受地方影响而各不相同的。在这个阶段，有相当部份的大、中学生红卫兵站到了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的所谓“反军派”一边，反对马上稳定政局，而支持继续造反。

第三个误区，即是“红卫兵”这个概念与“造反派”的概念等同起来。

文革的造反运动之火，应该说确是红卫兵点燃起来的，红卫兵是文革造反的始作俑者。但做造反派的不仅仅是红卫兵，而且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机关、干部、学生甚至包括一部份军人，其中尤以工人人数为最多。而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仅仅是造反派的一部份。

文革自一九六六起至一九七六年止，前后达10年之久，而红卫兵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却仅仅二年半时间，即从毛泽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之始，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的指示后，作为红卫兵的大中学生便退出了政治斗争而几乎全部被动员去了农村，从那以后“红卫兵”就不复存在了，而另一种身份“知青”（即“下乡知识青年”）便取代“红卫兵”桂冠而被戴到了青年学生的头上。

红卫兵退出去了，但在其后的七、八年间，文革并未停止，造反派的活动更没有熄灭，只是造反派的队伍中从此少了“红卫兵”即青年学生这股力量了。到了文革末期的一九七五冬至一九七六年夏。“四人帮”及迟群、谢静宜等人又一次启动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他们的政治斗争工具，发动两校的大学生们写贴了不少大字报，去“反击右倾翻案风”，去批判邓小平，似乎想重新祭起“红卫兵”的造反精神。然而，历史已不会倒回去了，此时的大学生们也远非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如果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还多少带有理想与自发的成份，那一九七六年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所写所贴大字报的举动，则已有着几近百分之百的官方指令色彩，已根本不能与当年的意气风发的红卫兵运动相提并论了。

□ 写于2001年1月6日

【史实辨析】

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一支奇特的政治势力

• 陈益南 •

所谓“造反派”，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支奇特的政治势力。说他们奇特，就奇在他们本是由文革的发动者扶持起来的，照理讲，他们应是一种得宠的“御用力量”，但偏偏在整个文革期间却又屡遭整肃、镇压，最后还随着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与“四人帮”的垮台，彻底完结。

说他们奇特，还奇在他們是最坚决最忠心的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他中央首脑机关（如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领导，但他们却又大造中国共产党各地方党委（中共省、市委）的反，几乎冲垮了中共的所有地方组织，使其处于全面瘫痪状态。而且，这些造反举动一时竟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首肯、支持与赞扬。

有史以来进行造反的人们，历来是既反贪官昏官与所有朝廷官吏，同时也会反那皇帝老儿。不管自己的力量如何，“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而直捣“龙庭”以取而代之的祈望，都或多或少是造反者们的梦想。而唯有文革中这些也贴着“造反”标签的人们，却铁定了都是保卫中央、只反地方的方针与观念。即便是被认为思想最极左的一小批知识分子造反派，他们的观点也就不过是认为党中央的某些文革政策“偏右”了点，或认为党中央的某一位领导人在文革的作法“温和”了点而已，而绝无半点反对或推翻共产党领导的邪念。哪怕是在造反派势力处于高峰、并都已拥有了不少独立的武装力量的一九六七年夏季，也绝没有哪一个造反组织或造反派领导人会想去反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相反，他们都坚定地将自己当成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最忠实的“革命力量”，任何对党中央毛主席不敬的观念和言行，都会遭到他们的严厉批判与打击。

因此，“造反派”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就变得非常扑朔迷离，给人以多种形像。

在文革中被造反而遭到批斗的中共地方党委的官员们眼中，造反派的行为就是“反革命罪行”，而造反派就等于是“反革命分子”。而在文革中受苦受难了的社会贤达和社会最底层的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国民党旧政权的官员、右派分子、坏份子）的人们眼中，造反派却又是中共路线最具坚决性和代表性的冲锋队式的势力。到了远距离观察中国文革运动的外国人眼中，以及今天相当多不熟悉文革历史的年轻人眼中，不是将整个造反派当成文革10年的受益者和权力新贵外，就是认为造反派是一种社会的破坏性力量。

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曲折复杂的史无前例的状况所致。

可以说，相当多的人和现今各种媒体的认识、宣传与展示，对文革历史的了解都有着一种片面性，其中更有不少杜撰与想当然。由于他们地位的局限，他们看到的“摸到的”造反派这个“大象”，都只不过是“大象”的或尾巴或鼻子或耳朵而已。

今天有谁了解：造反派竟是从文革初期挨整的“小邓拓”、新“右派”与“黑鬼”们中产生，而最终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又仍然随着文革的结束成为了被整肃、被入“另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历史殉葬者？有多少人能清楚：红卫兵中有造反派，但造反派并不等于红卫兵，而造反派本身也派别林立、造反程度各有千秋？又有谁明白：除了上海的王洪文那一伙造反派外，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造反派在文革10年中竟然屡遭镇压之厄运？而谁还明白：上海的造反派曾有过整整10年的“幸运”，那却只是多灾多难的全国造反派之外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特例？还有谁知道：造反派在文革中不停在造反，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时造反组织的发起人，基本上是在文革初期被打成“小邓拓”与“新右派”的工人、小干部、教师等社会底层的群众，他们大多以后都成了这组织的头头。但是，以后十年的历史表明，这些因被整成“右派”而造反、而又因此当了造反组织头头的人，相当多的人是不具有做政治领导人应有的素质，他们不会有效的驾驭握在手里的权力，不懂得政治斗争的策略，不懂得所谓“面子”与“实质”的辩证关系，不知道经常要会“妥协”、会采取经常与不同的对象结成联盟的战略，甚至还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部下。因此，每每造反派的有利之时，往往就又是造反派们的分裂、打内战之际。所以，相当多的人能坐到头头的位置，仅仅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潮流将其推到了那造反组织领导人的地位，而并非他们的才能所致；甚至，他们自己都坦率地承认：从未想到过自己会当“官”。

不过，这之中也确有一些造反派头头是具备大将之材，甚至有着做领袖的才干与素质。

例如，在那群众组织多如牛毛、派别林立、时事一片混乱之际，这些造反派头头硬是用种种手段，协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平息了种种乱源，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局面，做到了短暂的“一统天下”。

顺便说说王洪文这个人，实践证明，他并不具有大将之材，更别说领袖素质了。否则，中国近些年的历史也许就要重写了。王洪文之所以能在上海滩整整威风十年，没有经历象其他省的造反派们所承受的几上几下的“反复”之磨，还能达到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这完全是因张春桥、姚文元将上海视为他们不容动摇的根据地、而毛泽东又极欣赏支持张、姚这一特殊原因所致。

当然，这种有大将之材的造反派头头并不多。据观察，这些人基本上都没有受过如何成功地做政治领导人的学习与训练，也没有担任较大的领导干部的经历。但是，他们为何能在那乱世中的一大批造反派头头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呢？也许，除了他们爱学习或善于在“游泳中学游泳”的优点之外，最特别的因素应该是他们天生就具有极强的“事业高于个人感情”的性格。

□ 写于2001年1月6日

~~~~~

### 【史实辨析】

#### 文革中地方基层政权的变动情况与历史责任

• 陈益南 •

—

现在人们一提起1966—1976年间中国的文革时期，就会说：“四人帮当权时……”或“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等，总之，给后人的印象便是，在文革十年期间，一直是林彪与“四人帮”一伙在执掌着中国的政权。显然，这里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应弄清：

（一）文革十年，始终仍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构在领导着执掌着中国大陆的政权，而并非由林彪或“四人帮”一伙当主宰，虽说他们也掌握着相当大部份权力。

（二）中央政权以下，包括省一级的政权，直至城市中的街道、农村中的人民公社的“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最小的工厂企业与其他“单位”，在文革期间，政权的性质与掌权的人却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发生过几次大的、甚至是天翻地覆的变动。

现在许多人在回忆自己在文革中的种种不幸遭遇时，都会对那段时期的政权或当权者表示某种愤慨，并且往往将那段时期的政权性质都概视为“四人帮当权时”。而实际上，除非是在中央一级某些部门、或是在上海市那个独特的地方，他们所说的那段时期的政权及掌权者，往往都不全是什么“四人帮”一伙的人，也不全是什么“造反派”在掌权，而绝大部份都是那些在文革前就当权、而且在“四人帮”垮台前后也都掌握着政权、并被人们称之为“老干部”的阶层。可以说，文革十年中，全国省及省以下的地区和单位，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说在1949年之前，是国民党在执掌中国的政权；但我们若说1966—1976年间都是“四人帮”一伙在当权，那不论在整个中央或是在绝大部份省、区、市地方，这种说法都是与历史实际情况不相符的。

当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于1976年10月6日在一个晚上将“四人帮”一伙人全部抓起来后，除了上海方面有一点点不满外，全国各省市区都不但没有任何异议，反而马上表明了对打倒“四人帮”的支持。这就充分说明，全国省区级及省以下的基层政权，实际上并不在“四人帮”的控制之中。

## 二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全国地方基层政权大的、全面的、性质上的变动有过两次。小的、局部的变动则有若干次，而且各地变动情况与时间都有一些差异。下面将分别予以阐述。

文革虽说是从1965年底由姚文元发表《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起就开始了，但在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并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罢免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后，才真正在全国人民中引起震荡的。从1966年6月至12月底这半年时间里，省、市、区及省市以下区的政权依然还是由文革前当权的被称为“老干部”的人们在领导着，随着文革的进行和“造反派”的兴起，他们的权力当然在逐渐削弱，但直到年底，政权的领导权基本上还是在他们这些人的手中。

因此，请注意，凡是在文革的1966年的6月—12月期间，遭受到有组织的政治性质的伤害事情，这些具体进行侵害的组织及负责者，一般就是这些尚在执掌着政权权力的人和机构。什么支持“老红卫兵”斗老师打“坏人”的恐怖血腥事件，什么揪“小三家村”“批黑帮分子”“抓新右派”，什么逼死著名作家老舍、迫害音乐家马思聪、伤害文化名人……等等那些事情，就都是发生在这一段时期。中共地下党出身的四川老作家马识途写过一本书，就详细描述了他自己在1966年6月起被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打”成“黑帮分子”的事。在此期间，虽说“四人帮”中的三位（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逐渐在中央获得了权力；但在地方上，“造反派”却还没有正式登上舞台；“四人帮”中的另一位角色王洪文，本人也还尚在他那上海国棉十七厂内，以一个普通保卫干事的身份在写写大字报而已。在这期间“地方”上发生的一切不幸事情，历史的责任显然只能由上述掌权者承担，而不是由什么“造反派”去背那“黑锅”。

## 三

自1967年元月起，由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决定让正闹得热火朝天的“造反派”们去夺基层政权的权，1967年元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社论，号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去夺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这样，“造反派”便开始涉入政权的权力机关了。而那被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的人，也就是文革前便一直当权而且直至文革进行半年了仍在掌权的“老干部”们。

全国性的基层政权的夺权行动，又是从毛泽东策动文革战略部署的上海开始的。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联合其他一些造反派组织，在得到中央支持后，于1967年一月一举全面将原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打倒”，而建立了新的上海市政权机关——“上海人民公社”（后因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试图模仿“巴黎公社”的名称，而改称为“革命委员会”）随后，黑龙江省“东北的新曙光”响应，“造反派”在那里夺权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政权，并称之为“新生的红色政权”。但其后由于各地的“造反派”造反运动发展并不平衡，种种原因，致使全国（除台湾省）的省一级“革委会”政权在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后一年多的1968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后，才得以全部建立，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

所谓的“新生的红色政权”即“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的建立，标志着两件事的发生：

（一）自1949年建国以来直至1966年底始终处于领导掌权地位的大批省级及省以下的“老干部”们，被剥夺了他们手中的权力。

（二）以原来仅是普通工人、农民、小干部之类“群众”身份的“造反派”代表人物或头头们，开始进入了政权机构，执掌或多或少的权力了。

“革命委员会”政权自产生起，文革中大约存在了8年时间，在打倒“四人帮”后也还存在了一段时期，才改为了现在的称呼：人民政府。

文革中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政权，其特点与性质并不完全都是一样。

在真正属于“政府”性质的省（市）、地（市）、县（区）这三级权力的“革命委员会”，其构成都是严格按中央的规定：由解放军代表、能及时“亮相”拥护中央文革路线的“老干部”、“造反派”头头这三部份力量即所谓“三结合”组成。而之中，由于当时“林（彪）副统帅”势力影响都很大，故军人在“革委会”中起主导作用，各省的“革委会”主任（一把手）基本都是由军人担任。而“造反派”则因当时尚得到中央的肯定，加之“造反派”人多势众，故开初的“革委会”中，“造反派”头头也有着较大的发言权。“亮相”的老干部在刚成立的“革委会”中，因其基本上都挨过“造反派”的冲击，故其权力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但没过多久，（大约不到一年时间）随着中共“九大”的召开，全国基层因文革而瘫痪了的共产党组织，又全面恢复其正统的活动与权力，那些本是靠“造”基层党委“反”而崛起的“造反派”头头们，由于不知何故而再得不到中央的继续扶持，便逐渐被从权力机构中撵了出去（上海市是特例除外）。至1970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所谓“一打三反”运动和1971年5、6月间开展的“抓五·一六分子”运动后，省及省以下的地方政权中基本上没有什么“造反派”分子了。所谓“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也只剩下军人和“老干部”这“二结合”了。

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李素文等人，虽然也都是以“造反派”组织负责人的身份进入权力机构、并在后来还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国务院副总理高位，但毛泽东提拔他们却并不是喜欢其有什么“造反派”标记，而主要是看重他们的“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的身份。（陈永贵是“农业学大寨”的领头人，倪志福是发明“倪志福钻头”的著名工人工程师，吴桂贤则是纺织系统的老模范的优秀传人，李素文是全国闻名的商业战线售货员标兵）严格地讲，陈永贵等人还算不上文革中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而只是中性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因为，“造反派”头头一般都是文革初期有过被整为所谓“黑帮分子”与“新右派”的普通群众与小干部，而陈永贵等人则没有这样的经历。

而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爆发，随着林彪集团的垮台，军人便很快也从地方政权中撤了出去。这一方面，是由于各省“革委会”的主任相当部份是林彪系统的人而自然倒台。如江西省的程世清、湖南省的卜占亚、湖北省的曾思玉、刘丰、浙江省的南萍等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军人过于干政而有所顾忌与不满所致。这样一来，所谓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便仅仅剩下了“老干部”们单打一了——这，便意味着省与省以下的地方基层政权，又重回到文革前就执掌政权的人们手中了，虽然还有很多的老干部没有回归原位，而是由另外的老干部的执政（如后来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在文革初还只是中共湖南省委的第五位书记，而到1971年时他则是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了）。

这就表明，在1967年元月起被剥夺了地方基层政权权力的老干部们，在经过1967、1968两年绝对无权时期、1969、1970、1971年三年的半权力时期，到1971年底起，便又重回到全部权力的岗位。而1971年，尚只是文革的中期，此时离“四人帮”的倒台还有五年！

文革中发生的张志新、遇罗克等革命志士，因追求真理说真话而被割断喉管及惨遭杀害的事件，也就都是发生在这一段时期，而不是发生在1967年的“造反运动”之中。

#### 四

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不仅在省、地（市）、县（区）行政区内建立，而且，也还在所有的工厂企业、学校、农村人民公社及其属下的“大队”等被称之为“单位”的地方都建立了。不过，这些“单位”因不是政权性质，故它就没有按必须有军人代表参加的“三结合”模式，而只有“老干部”与“造反派”头头

的“二结合”。因此，工厂企业等“单位”的“革委会”，其特点便与地方政权性质的“革委会”稍有一些不同。

因为“老干部”们在进入“革委会”前，大都有过挨“造反派”们冲击批斗的经历（1967年至1968年期间），故他们即便又进入“革委会”重掌权力，在开初也仍有些心悸。因而，在“革委会”前期的大半年时间内，各“单位”的“革委会”基本上是由“造反派”在左右。但到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后，形势便发生了变化，“老干部”们的权力逐渐强大起来。到1970年初进行了全国性的“一打三反”运动时，“造反派”不知为何成了中央发动的这次文革大运动中的小运动的整肃对象。结果，在这次小运动后，“造反派”们便基本上被从各“单位”的“革委会”权力机构中清洗出去了。从而，自1970年初起，各“单位”（工厂企业、学校、人民公社及其属下的“大队”等）的“革命委员会”即“单位”的领导权，又重新回到了文革前的领导人手中，直至1976年“四人帮”垮台也没有再能易主。

在文革中，这段时期有六年以上，即1970—1976年。工厂企业等“单位”的老干部全部重掌权力的时间，比地方政权中的老干部重掌全部权力的时间大约早一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所有的“老干部”们掌权的地位当然就更稳妥了。

## 五

“造反派”们在文革十年的地方基层政权变动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或他们在文革期间的权力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个问题中，首先必须将上海市的情况区别开。因为，由于毛泽东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两人的特别重视，以及张、姚两人对自己发迹的根据地上海的特别关注，至使上海“造反派”的地位与全国其他所有地方比，具有着极优越之处，从而使上海的情况成为了一个特例。所以，文革十年，上海的“造反派”也就风光了十年，1967年的所谓“一月夺权风暴”后，直至1976年“四人帮”垮台，近十年时间，上海的各级政权就一直在“造反派”们的手里，而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而在全国其他省区，情况就远不是这样了。

在其他省区内，“造反派”们掌握到政权权力的时间，基本就是在1967年至1968年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时起，而至1970年初止。掌权最长者时期大约三年不到，最短者时期者大约一年半。这也仅仅是指进入了“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而言，实际上，“造反派”并没有真正有过能独自全部掌握权力的时期。（上海市除外）

其中，由于各地造反运动发展的进程情况不平衡，有极少数省区后来能进入“革命委员会”的所谓“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而是文革初期的“保守派”（由保卫党委的党、团员为骨干的群众组成）。因为，随着造反运动受到中央的支持而势不可挡，许多原来是“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也都改称自己为“造反”组织了。由于有些名为“造反”的“保守派”组织势力强大，经过几番较量后，反而将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击败，结果，进入“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居然主要是这些“保守派”代表了。那时，大概中央希望那些长期派战不停的地方，只要谁能控制该地区的局面，便也承认谁是“造反派”组织，而不太考虑真正谁“造”谁“保”的性质了。故有些省区便出现了由“保守派”进入“新生的红色政权”这类事。最典型的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惨烈的派仗打了近二年，结果，“造反派”组织“四·二二”竟被“保守派”的“联指”（广西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赶出家园，逃出区外流亡。最后，“联指”在广西军区司令韦国清的支持下，还得以进入区“革委会”掌权。因此，在广西，可以说，（除桂林地区“造反派”组织“老多”有较强势力临时夺过权之外）“造反派”基本上没有真正掌过一天政权。

既然“造反派”们在1970年前后就基本被赶出了政权机构，那么，在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与1976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造反派”们在闹些什么东西呢？



他们在争取两个东西：

第一，他们又一次在要求给自己“平反”。

第二，他们在“要官”，即希望恢复他们在1968年时曾有过的、而在1970年又被剥夺的“革委会”中的职位。

这两件事实际是相关联的。因为，不知为何，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以及中央文革那帮人，竟然容许进入了“革委会”的军人和老干部们，利用一个本为打击反革命和贪污盗窃分子的“一打三反”运动，而对原“造反派”来了个“秋后算帐”，不仅将“造反派”们全部清洗出权力机关，而且，还用正常秩序时的标准去衡量“造反派”们在造反非常期间的言行，并当作罪行对待，如“反对党委”“打砸抢”等等。在文革中，连中共中央文件都曾号召造党委的反，连坦克大炮都曾用上了的文攻武斗全面内战，此时若用“反对党委”和“打砸抢”作罪名去整“造反派”，哪个“造反派”能逃脱得了？因此，凡在1967—1968年间“造反”活动搞得积极者，都在1970年一一落入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网内”，又一次被整成“反革命分子”或“坏份子”，有的甚至还被投入了监狱。

1974年的“批林批孔”和1976年春天的“批邓反右”，给已沦为新“反革命分子”的原“造反派”们又带来了希图给自己“平反”的希望，于是，他们又一次积极投入了这两场新的运动（实际上是他们的又一次被利用）。要求“平反”是主要的目的，“要官”则大部份目的是试图以恢复1968年有过的“革委会”“官位”，以官员的荣耀来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虽然的“批林批孔”与“批邓反右”那两次运动中，“造反派”短暂地部份如了愿，给平了反，也恢复了其在“革委会”的头衔，但此时的权力已不再是什么“革委会”，而是又已运作几年了的各级“党委会”。不过有个“革委会”中的所谓“群众代表”头衔的“造反派”们，此时充其最大能量，也就是作一个政权中的“反对党”而已。当然，1976年之后，最终他们还是没能逃脱掉“反革命”或准反革命分子的命运。

是毛泽东及中央号召他们去“造反”的，但后来“中央”却不知为何又不保护他们了（首都三司造反派红卫兵司令蒯大富与他的伙伴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学生，甚至在1969年就被赶下台、1970年就遭到拘押）。其实，“四人帮”一伙在台上时，“造反派”就早已倒了大霉，而并非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才入“另册”的。这才是历史的一页真相。

因此，没掌几天政权利力的“造反派”，其实不应对长达十年的文革中所发生的悲剧负多大责任，实际上，“造反派”本身自产生至完结，自己就是一件大悲剧！

“造反派”掌有权力之时负有历史责任的主要事情，大概只有一件。

那就是1968年间全国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那场声势浩大、以北京“六厂二校”（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厂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模式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造反派”们都还处于“革委会”权力中心，也有着一些不小的权力。当那些原有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新揪出来的什么“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等，被非法拘禁、抄家、批斗时，曾在文革初经历过被戴上“黑帮”“右派”帽子的“造反派”们，不会没有一点同病相怜的测隐之心。但终于，坚信毛泽东路线与中央绝对正确的“造反派”们，却没有凭自己的良心行事，而是也不同程度的积极地投入到了那场践踏人权的运动之中。虽然，在这场运动中，“造反派”还不是主力军，而只是三分之一的权力参与者。

应该说，只有1968年间的上述时期与所做之事，才是“造反派”应于负责的耻辱。

在1968年间还发生过将大批国家干部驱至所谓“五·七干校”的事情。那件事，实际上是当时中央的

一项精简机构的政策，而由各地“革命委员会”予以执行的。“造反派”作为“革委会”的掌权人之一，当然与此事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不论将大批国家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这件事的性质如何，若要由“造反派”来对此事承担历史责任，则显然是不公平的。一则，这是一项由当时的中央决定的方针，而并非由“造反派”策划；二则，“造反派”在“革委会”权力机构中并非处主宰地位；第三，同时也有许多属于“造反派”的国家干部被下放到那“五·七干校”，可见，将大批干部驱至“五·七干校”根本不是“造反派”的本意。

## 六

在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后，至建立“革命委员会”政权之前，各省区地方与单位还出现过一段权力胶着或“真空”时期，即所谓“旧权力不能发生作用了，而新的权力尚未能建立”时期。这是因为原有政权机构无法正常运转，老干部们都被“造反派”批斗后而“靠边站”不能作为，而“造反派”又疲于或与“保守派”作斗争，或忙于“造反派”之间的内战，尚不能建成得到中央批准的“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的权力机构而导致的。

那么在这段权力胶着或真空期间，是不是就完全处于了无政府状态呢？

当然不是。虽然整个文革期间无政府倾向经常出现，但真正全面的无政府状态也并没有发生。因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权威仍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与作用，就是最狂热最激进的“造反派”组织或分子，也都必然无折扣地要服从“中央”的领导，否则，他就真的会遭到其他所有人的声讨与反对。文革，毕竟是由“中央”自己主动发动搞起来的，并非自发产生于下面的动乱，何况，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还牢牢掌握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手中，强有力的威摄着任何胆敢捣乱者。

在上述权力真空时期，国家和社会机器的运转，有这么两种形式：

（一）“旧政权”的官员与“造反派”们共同临时执行办事，发通知下文件什么的，就同时盖上原权力机构的公章与“造反派”组织的大印；

（二）势力强大的“造反派”组织临时“夺权”，接管实施“旧政权”的部份权力（主要是生产指挥权）。

当时实际上国家与社会的很多权力都被中央宣布冻结了，如全国的工资、物价、人事关系等等（奖金则被取消了），都不准任何地方和单位变动，不论谁在执政，都必须照旧章法行事。即便是真需要改变的具体小政策，也不准实行，而必须“留到（文革的）运动后期再议”。因此，实际留给“造反派”可夺的权力并没有多少，就是所谓“夺权”，也只不过是换换掌权的人而已，中央对全国的领导，并不会在本质上有什么变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后至1968年成立“革委会”前的那段权力真空，也就没有对社会造成多大更特别的震荡。

□ 2001年2月4日

~~~~~

【史海钩沉】

华国锋：在文革中崛起

• 陈益南 •

培根说：性格决定人的命运。

其实，培根只说对了一半。

决定人的命运的，还有另外一半因素：机会或运气。

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那么多相同性格的人，其命运却千差万别。

文革前夕，尚只不过是湖南一名在省委排行倒数第二位书记的华国锋，经过几年文革一番折腾后，居然做了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的领袖、共和国的一号当家人。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机运，全中国的聪明人加在一块测算，就是将他们的脑袋都想烂，就是他们能列出1000个接班人名单，之中也不会有一个人会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主席会是华国锋！

二

来自山西交城山的华国锋，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湖南省后，便奉命停了下来。时年29岁的他，凭其曾有过中共地方武装县大队政委的经历，立马被任命为湖南省湘阴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并且在湖南一干就又是一个27年，直至1976年10月当上中共中央主席，站到天安门城楼上象毛泽东那样挥手时，他才不再在湖南兼省委第一书记之职。

华国锋在湖南的的仕途，文革前的17年，虽说不上有什么大的破格越级提拔之事，但总的来讲，也还算比较顺利没有什么周折，从县委书记做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一、湖南省副省长等职。

在这期间，湘潭地委书记与韶山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政委这两个职务，是华国锋在日后能被提拔到中央工作的极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毛泽东之所以能从无数的省级干部中注意到华国锋这个党内的后辈，就是因华做过毛泽东家乡湘潭的“父母官”与毛在回韶山时几次游弋过的韶山水库工程的指挥官。就是这两个官职难得的特殊性，使华国锋一旦进入毛泽东的视线范围，在感情上就自然受到毛的特别青垂与关注。

1966年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初起，当风起云涌的造反派在受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号召、鼓励与支持下，掀起了批斗所谓“走资派”与夺权运动后，华国锋如同其他的省委领导人一样，也受到了冲击，并被剥夺了权力而“靠边站”了。如果没有下文所述发生的情况，华国锋本来也将会象千千万万其他领导干部那样，随着文革运动的进展，或先或后的经历一个“挨批斗”、“靠边站”、“被解放而重新工作”直至恢复原有级别职务、又最后离休完事的过程，了结一生。

然而，一个在历史上注定不会有什么重要地位的人，与一个在当时看来并不十分重要、也并非必然的举措，却从起始上改变了华国锋的仕途以至人生的地位，使他以浓墨重彩的身份走进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并占有了很重要的一页。

这个无意中在1967年起始拨动了华国锋仕途与人生航向的人叫章伯森，也是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之一，正式职务是省委书记处侯补书记、副省长。

三

湖南省的文革运动，在1967年时，其主内容就是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派战。

两大派之一的是以“工联”与“湘江风雷”组织为主的造反派，其成员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厂的产业工人

为多，组织有方，人多势众。其时的政治方针则是反对省军区，因为省军区在1967年初曾动用军队镇压过造反派，还将全省近万名造反派的骨干抓起关进了监狱。

另一派则是以湖南省八大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高司”为主，加上部份工人。“高司”红卫兵原本是湖南最早的造反派，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俑者与发动者。只是因为如何在如何夺省委的大权问题上与“湘江风雷”等工人造反派发生了分歧，加之，后又得到奉命出来“支左”的省军区的有力支持，于是，“高司”便采取了与“工联”、“湘江风雷”等组织对抗的强硬立场。由于这个政治立场，“高司”也就得到了持保守态度的工厂企业的大多数党、团员们的支持，因而，使“高司”蒙上了“保守派”的色彩。

两大派的斗争自然异常激烈，从大字报口诛笔伐，一直闹到武斗时机枪坦克大炮都对上了阵，简直就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哪一派都希望将对方打垮，自己一派能夺取湖南省的大权。

文革中，群众组织间的拼斗，绝不会仅仅就只是他们之间的事，随着运动的深入，党政军各部门的人都不可能地会卷了进来，站到某一派的立场。

湖南省军区自然是站在“高司”派一边，但“工联”方面也不是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解放军驻湘的军事院校与野战军部队47军就先后宣布支持“工联”为主的造反派。

省委的书记们呢？也没有能超脱掉，所谓“亮相”一词，就是指文革中各级党政领导人公开支持某一方某一派群众组织的举动。不过，地方党政领导人当时却没有军队司令政委们的那种特权，因为当时要批判要打倒的“走资派”只是地方干部，军人则基本安然无恙。军队奉中央之命“支左”介入地方后，又都是以裁判似的“太上皇”身份出现，群众组织则是以军队能支持自己为荣。但地方领导干部对某派群众组织的支持，却有着“投靠”其的含义，而且这“支持”，对方愿不愿接纳，也还不一定。

四

1967年4月22日，中共湖南省委侯补书记章伯森率先发表声明，“亮相”支持造反派当时查封《湖南日报》的行动。

5月12日，章伯森率25名省、厅级领导干部发表《我们对当前形势的声明》，再次“亮相”，明确坚定支持“工联”造反派，指责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而在几乎同期，5月9日，为了能随时批判省委的“走资派”，“工联”方面则秘密将华国锋等人抓到“工联”属下的、已由造反派掌握大权的长沙汽车电器厂（“汽电”）厂内，予以软禁。5月19日，“工联”等造反派组织还召开大会，批判斗争了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与时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会后又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可见，当时，华国锋在造反派们的心目中，还是属于要打倒的对象，是属于“走资派”另册上的人物。

但已表态支持“工联”等造反派的章伯森，毕竟是政治经验与官场套路都很丰富的老干部，他觉得自己省委侯补书记的地位，作为支持造反派的省级领导干部的第一把手，份量尚不够。因此，他一站到“工联”这一方，便建议“工联”方面去做华国锋的工作，争取华国锋也能“站过来”，出来公开支持“工联”造反派。

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各书记状况如下：

第一书记：张平化，已由中央召去北京接受审查；

第二书记：王延春，已由中央定性说有叛徒嫌疑；

书记：周礼，半离休；
书记：李瑞山，中央已将其调往其他省（后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
书记：胡继宗，调走；（后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
书记：徐启文，态度不明；
书记：万达，后表态支持“高司”派方面；
书记：华国锋，态度尚不明；
书记：于明涛，态度不明；
侯补书记：章伯森，已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
侯补书记：苏纲，态度动摇不定，但传说也有叛徒嫌疑。

被章伯森说服了的“工联”头头们，立即采取行动，由“工联”一号头头胡勇（一个时年31岁的汽电厂工人、后曾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亲自出马，找被他们软禁在“汽电”厂内的华国锋谈话，希望华也能像章伯森等人一样，站出来公开支持“工联”等造反派。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举事的新军官兵们虽说已不把大清王朝的权威放在眼中了，但真要以他们自己领头开国，他们却又还深感底气不够。因此，他们便不惜以武力胁迫，强逼推举旧日的地方长官黎元洪来出任他们起义的新首领。结果，致使本来对清王朝与革命都是颤颤兢兢的黎元洪，后来竟由此而有机会在中国现代史上风光风光，还登上了一回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

1967年5、6月间，湖南的造反派对华国锋所具有的态度，和华国锋本人的心态，竟然与56年前的那页历史外貌有着某种微妙的相似。

当时，华国锋对胡勇的劝说，虽然没敢取对抗方式，但却以种种不便的理由，哼哼哈哈地不表示明确态度。

显然，当时湖南的两派斗争实在太激烈，谁胜谁负鹿死谁手尚难定论。虽说“工联”造反派势力不小，但是，“高司”派的背景也不容忽视，尤其，支持“高司”派的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曾是“林副统帅”的一员爱将，又深得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器重。对此，具有“不见兔子绝不撒鹰”晋商性格的华国锋，自然不敢贸然鲜明亮出自己的立场。他口头上说应该支持造反派（因为远在北京的中央都支持造反派），但又说不能具体只支持“工联”等造反组织，还说自已得听从组织的安排，个人不好随便公开表态云云。

华国锋这种不冰不火、不激进也不落后、不主动出击但却能坚定防守、能使他的上级信任放心却不能使他的部属与同事铁心拥戴的稳妥性格，可以说既是他能一步步升迁、直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入主中南海的重要主观因素，同样，这也是他在中央主席高位没能坐几年的一项个人根本缺陷。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

对华国锋的这种暧昧态度，胡勇等人非常不满，谈了几次没有什么效果，便决定对其予以放弃，另择合适对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虽说还不能随意将领导干部们置于死地，但要将他们列于被打倒的“走资派”另册，促使中央降其职、罢其官，那还是不难的。当时华国锋如果真没被造反派选中，作为“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进入省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相反，却被作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予以打倒，或将其撇在一旁“靠边站”数年不能工作，或将其送进“学习班”去“改造”，那么，不论此后的情况如何，华国锋能被毛泽东认识关注，以至由此而进入中央工作的可能，就几乎为零了。

历史差点在这儿就要拐一个弯了。

还是章伯森，在这个关键之时，又一次无意地继续拨动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航向，使其仍朝一个出人意外的发展方向前进。虽然，章伯森本人全然不知自己是在推动一个重大的历史画页缓缓出现。

对于湖南省的文革情况，中央无疑是极其关注的，因为，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结束混乱局面，尽快成立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省革命委员会，是当时中央众多领导人的一大心愿。

1967年6月15日凌晨4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章伯森，要他马上随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去北京汇报湖南文革情况。上午11时，章伯森与省委机关支持造反派的省计委副主任梁春阳等即乘机赴京。

6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领导人便接见了詹才芳、章伯森等人，详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五天后的6月20日，在北京的章伯森、梁春阳与“工联”头头胡勇一道，向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湖南军区介入地方文革的情况时，肖华便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指示：找华国锋来京。

6月20日晚，兴高采烈的章伯森从北京打电话给长沙方面，传达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明天上午去北京。

这是6月15日由于章伯森到北京后，向中央领导人一再说了华国锋的情况，希望中央能让华出来工作。所以便有了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马上去北京汇报的事。

此事，真正得到益处感到荣幸的无疑应该是华国锋，他当时也确实很高兴了一番。

然而，那时似乎章伯森比华更觉欣喜倍感自豪，因为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实施。

“工联”的头头胡勇当即于20日下午从北京飞回长沙，立刻到“汽电”厂找了华国锋，向他讲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华国锋没有任何迟疑与哼哈，当即，他就马上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并写了一个“亮相”声明。

6月21日上午，华国锋去北京前夕，发表了《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亮相”声明的大字报。其内容大致为：

- （一）改正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 （二）1967年二月逆流中，（省军区）借肃清“湘江风雷流毒”打击造反派是错误的；
- （三）“红联”“高司”“公检法”等保守组织是党内走资派的御用工具；
- （四）支持“工联”，向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学习。

21日上午11时，在“工联”造反派头头胡勇的陪同下，华国锋从被软禁地“汽电”厂出发，乘汽车往长沙机场登机赴京。

华国锋登机后，“工联”方面马上以大字报与传单形式将他的声明公布于众。因此，后来造反派们常常戏言说，华国锋是在“空中亮相”，是“云里雾里（飞机上）亮的相”。

6月24日，“高司”派方面贴出大字报说：华国锋的“亮相”声明，是他被“工联”方面斗争一个多月后，由“工联”起稿、硬逼着华国锋签的字，因此，当华登上飞机后即宣布作废了。

对此传言，6月27日，华国锋专从北京来电说明：“我是共产党员，是不能在什么所谓压力之下把不是自己的观点而说成是自己的观点去欺骗人民。所以肯定我的大字报是反映了我的思想实际的，不是什么逼出来的，

请大家不要相信谣传。”

华国锋的这份来电，自然由“工联”方面又抄成大字报，贴满了长沙市全城。

六

1967年6月21日，是华国锋从长沙赴京的日子，也是他仕途与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起始点。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天的赴京，便也才有了华国锋在9年后登上天安门入主中南海的“顶峰”岁月。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在这个文件中，华国锋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第二号负责人（第一把手是来湘“支左”的47军军长黎原），章伯森的位置则排在了他的后面。

第二年（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华国锋自然做了省革委会实际的第二把手。（主任仍是47军军长黎原）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以中共湖南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华国锋首次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1971年林彪事件后，受到毛泽东关注的华国锋，于10月3日便被调京，成为国务院业务组一员（相当于副总理工作职位），全面跃上了“中央领导人”这个台阶，开始了中央工作的仕途经历（但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却始终兼任至1977年）。

在1967年6月华国锋表态公开支持“工联”等造反派、并由此而得以当上省革筹负责人后，当年的9月17日，便幸运地获得了其时正视察大江南北到了湖南的毛泽东的召见与亲切面谈。毛泽东在此次视察期间，在各省召见的，都是当时各省已居军政领导的第一、二把手，无此等资格者，是无缘见到毛泽东的。这一次召见，无疑使毛泽东深深地记住了华国锋这个人，进而为华国锋日后的仕途进程，奠定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坚实的铺垫。

1969年11月12日，来湖南视察的毛泽东再一次召见了华国锋，向其了解湖南的形势，并对湖南的情况与华国锋的工作都深表满意，进一步确立了对华国锋之印象深刻的好评。

而如果没有1967年6月华国锋支持造反派的公开“亮相”，可以肯定地说，那么华国锋便不会、也没有资格受到这几次无疑决定了他后来重要命运的召见，由此，那华国锋以及当代中国的历史，就都将是另外一种画面了。

七

章伯森，安徽桐城人，出生于1915年（比华国锋大五岁）。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黄克诚将军的部队南下至湖南，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1958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副省长，1963年进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1964年任省委候补书记。

文革中，于1967年8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第二副组长，1968年4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被任命为副主任。

“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以“追随四人帮的反党乱军”问题，受到停职审查；1984年3月，经中央批准，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一级工资。1995年去世。

【研究动态】

西方的文革研究

• 徐友渔 •

首先，我声明我搞文革是业余的。我原来是搞西方哲学的。我看了西方学者研究文革的文献，觉得人家远远领先于我们，我们90年代的研究比西方70年代的研究还落后。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怎么能这样呢？因此我才转向文革的研究。我并不准备研究文革的意义，历史地位，我认为，首先要把世界上研究文革的流派观点梳理清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四川有一位数学家，证明了一条定理，很高兴，人家却告诉他这条定理200年前法国就有人证明了。我想在研究文革之前，首先了解很多有智慧的学者做了什么，再审视自己的思路还有没有意义。做学问之前一定要知道别人做了什么。

研究文革，要着眼于未来，而不是纠缠于历史旧帐。比如腐败问题，有人认为一定要由文革这样的运动才能解决，但我经历文革，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有人说文革体现了一些民主思想，毛泽东说群众运动“七八年来一次”具有一定道理的。但毛泽东的原文是“从天下大乱到大治，七八年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要跳出来。”七八年人家不跳出来呢？是不是要揪出来？这哪有什么民主？

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研究最全面的是西方。一方面，西方学术比较自由。一方面，带有最新的学术成果。而中国学者很多名为研究，实际上是报告文学，西方研究实际上独霸天下。哈佛大学就打算编一本包括所有研究文革文献的全书。

一般认为文革始于1966年5月16日，但实际上1965年底姚文元就开始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1月1日，北大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就写了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为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称点燃了文革的烈火。文革才开始，不过两个月，西方关于文革研究的文章就出来了，西方学者的学术敏感性不得不佩服。《共产主义问题》杂志，9月份第5期就登出文章《毛主义是什么？》从第六期起，每一期都有专题讨论，栏目名叫《新革命》，延续了几年。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兰德公司，它的社科部从1966年夏天开始研究，67年出了一本书《中国的文革》，研究五个问题。一、毛泽东与其他同志发生了分歧，产生权力斗争；二、为什么会有分歧；三、周恩来的作用；四、文革时的外交；五、农村问题。1971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了一本书，研究文革的过程。1974年，澳大利亚人波什出了一本专著，专门研究浙江的文革。波什有有利条件，文革时他被破例允许留在杭州大学任教。

可以把西方对文革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西方学者主要研究文革中的权力斗争，文革不断打击走资派，不断推翻领导，为什么会被打成走资派？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深入到社会层次。群众运动不是乱来的，而是分成派别的，西方学者认为这反映了中国49年之后的社会矛盾，这种观点是中国学者万万想不到的。文革后期，广东许多积极分子面对政治清算，不得成千上万地逃到香港去，因此，各国许多西方学者就跑到香港去，专门寻找这些人来研究。第三个阶段是80年代中到今。以前西方学者的资料是有限的，改革开放之后，资料有所公开。瑞典斯哥尔摩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主任在北大泡了很多年，有一次，他又到北京，他要我带他去买资料，跑了一天，什么都没买；到我家去，我把所有资料都给他看，他只看上一份，其它的他都有了。西方学者的资料的齐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西方学者对文革爆发的直接原因研究得特别多，对高层领导人的思想分歧，权力斗争研究得特别多，而对中国民俗，社会结构等深层次的研究较少。比如一个高中男生批斗一个女教师，这从人性角度怎么讲？又比如

北京的女红卫兵打死了许多教师，这又怎么理解？我觉得可以从几千年的文化中寻找答案。

西方学者研究文革主要研究几个方面。一个是文革的基本情况。文革发生了很多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西方人隔得远，没有主观情绪，有些事情搞得比我们还清楚。毛泽东的特派员去武汉，被军区和群众组织扣押，暴打一顿，而当时毛泽东也在武汉，他不得不赶快飞到上海，否则也极有可能被“叛军”扣押，为什么连毛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林彪作为接班人、副统帅，为什么要叛乱、叛逃？这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不把基本事情搞清楚，怎么研究文革？又如二月逆流，西方学者注意到，不只是叶剑英等上层领导在反对文革，与此同时，全国各省都在捉人，捉了成千上万的人，监狱都人满为患，群众也上街游行。又如北大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写大字报，毛泽东不通知其他人，就叫康生拿到新闻联播广播。西方有的学者认为是康生指使其老婆指使聂写的，但我也到北大了解过，有的人认为聂是自发写的。聂元梓是否是自发写大字报，关系到文革爆发的深层原因，我们有些人连这样的事情都搞不清楚，就一揽子地说文革的意义是什么。

二是文革的原因。第三个方面是红卫兵问题，第四方面是文革期间的经济军事外交情况，第五方面是文革的后果。前三个我待会重点讲，现在先讲文革的后果。西方学者一开始就看到文革对中国未来有重大影响。他们认为，与文革的初衷相反，文革动摇了党的领导，动摇了党的权威。毛为了打倒一些领导，把他们的丑闻揭露出来，而这些人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文革实际上打破了这种威望。西方学者认为，文革使中国人有了更大的独立性。文革之前，一个人的老师，入团、入党介绍人对他有如上帝，文革后，人们明白自己要有独立性。一个红卫兵头目说：“那时候八亿人一个脑袋，文革的后果就是八亿人八亿个脑袋。”西方学者认为，文革使得中国整整一代人的纯洁和真诚失去了。他们为毛主席抛头颅、洒热血，但最后发现这竟是一场政治骗局。这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东西，而且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文革的一个后果就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际关系。49年之前，中国人际关系以家庭为中心，49年之后，人际关系变为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夫妻父子之间也要划清界线。文革使得人们发现，同志关系靠不住了，于是又转为49年前的状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后，革命原则荡然无存。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这是一个很魅力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自己建立的制度打碎？这是很难理解的。西方学者对此主要有三种回答。一、毛泽东与他的同志思想不同。毛泽东有敏锐的革命性，他认为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此时官僚集团与人民的新一轮矛盾又出现了，即毛所说的“干群矛盾”。毛的正义感使得他要发动文革，造就一代大公无私，不为物质享受迷惑的新人。为了造就新人，就不能让老战友掌握政权。二、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文革既不革命，也不文化。毛泽东害怕自己的大权旁落，因此发动文革。毛与群众有如慈禧和义和团。出现干群矛盾，群众本来最先要找毛泽东，毛却说：“这是我的敌人干的，你找他们去吧。”而利用群众打倒政敌之后，毛泽东又利用群众的天真欺骗、抛弃了他们。三、毛泽东的思想与别人有分歧，而要贯彻自己的思想，就必须有权，即思想分歧导致权力斗争。此外，还有一些有趣的回答，例如一位学者认为，毛泽东、刘少奇这两位最主要的革命家性格不同。毛喜欢直接接触群众，刘从事地下工作，习惯依靠科层组织，因此毛喜欢发动群众运动，刘喜欢党组织，最终是毛发动群众运动摧毁了党组织。麦克则认为，如果认为毛泽东只要当中国人民的领袖，就太小看毛泽东了。毛泽东要当世界共运的领袖。斯大林的贡献，毛无法与之相比，但讲个人魅力、能力、资历，赫鲁晓夫都无法与毛相比，为什么毛还是做不成领袖？这是由中苏两党、两国的实力决定的。因此毛就想通过继续革命，把制度搞好，解决苏联出现的干群矛盾。赫鲁晓夫提出“全民的党”，毛就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搞，月月搞，一搞就灵。

一开始西方学者不了解红卫兵，以为是义和团，比如北师大一群学生去到曲阜，把孔庙砸了，这在西方人眼中是不可想象的。但西方学者很快认识到，红卫兵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成不同派别。他们发现红卫兵分派有一条规律：全国都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这反映中国的社会矛盾。他们发现团员、党员多为保守派，而造反派多是吊儿郎当的人，他们的身分地位决定了，他们一派要维持现有秩序，镇压地富反右坏，一派要打碎党组织。为什么红卫兵会由人变成禽兽呢？当事人都认为，自己是为了毛主席，为了理想，为了革命，为了革命事业代代红。西方学者不信这套，认为这是为了获得利益。当时上大学，首先是家庭出身，党员最好，团员也行。而在中学，为了利益，竞争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例如，中学里盛行检举自己的父母以示政治觉悟。西方学者在

广州一所中学做过调查，发现一盆脏衣服，顶多十分钟就会不见，因为谁都不想放过表现自己的机会。竞争的激烈造成了深刻的矛盾。

时间不多了，现在再介绍两个文革论。西方有些学者认为，文革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上层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群众的文革。你说他是思想分歧也罢，权力斗争也罢，反正有一个上层的文革。而毛泽东为了打击政敌，放松了对群众的控制。下层群众的文化性质是反官僚，这虽然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但下层群众显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人民群众在利用这个机会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当时三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战斗队，可以宣传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半政党。有的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国人拥有了言论和结社自由。造反派实际上拥有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地盘，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毛来说文革搞一个月，后来改口说搞三个月，后来又说搞三年，结果搞了十年。这表明，毛泽东本来想运动群众，结果控制不了群众，变成是群众运动毛泽东。看似是群众围着毛泽东转，实际上毛泽东控制不了群众。但以我的看法，实际上，人民根本就没有言论自由，看似是无法无天，想骂谁就骂谁，连国家主席都能骂，但是，毛泽东不能骂，林彪不能骂，实际上江青也不能骂，否则扭送公安机关。而造反派、保守派实际上都是由军政势力控制，离开军政势力，两派都不成气候。

□ 2001. 4. 25

~~~~~

【研究动态】

说不尽的文革和被禁锢的文革研究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导言》

• 宋永毅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不仅在中国当代史上，而且在整个世界史上也写下了极为重要，又极为复杂的一章。已故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这样地评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诚如费正清所言，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与复杂性而言，它毫无疑问是“一个值得世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一场历史悲剧。毛泽东和中共因为党内斗争而发动的所谓的“革命”，使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中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宝贵生命，又使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及其家庭创巨伤重。此外，文革使知识贬值，文明扫地；还使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惨遭破坏。从这个角度，中国作家巴金早在1986年就发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的呼吁（《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p. 166）。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官方二十年来对这一呼吁一直噤若寒蝉，有意任其湮灭。在最应当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中国大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却成了巴金可能终生都无法实现的梦。

文化大革命又出乎意料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整个政治和经济面貌。当毛泽东和中共把他们原来就错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在文革中推向灾难性的顶峰后，只要是稍有良知的人就不难认识到原来他们被官方灌输的那套“主义”的疯狂和荒谬了。这也就是连文革后的中共领导人都终于被迫走向改革开放的社会动因之一。至于文革所激发的对所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怀疑和对大陆文革后民主运动的重要推动，又更是有目共睹的史实。从这一角度，文革在半个世纪来的当代中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更值得深入持久的认真研究。

文革结束已经有近三十年了。作为一个历史学的研究课题，海内外的文革研究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景观。一方面是“说不尽的文革”，即文革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持久的研究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九六年三十年内，全世界各种语言的研究文革的著作，就达七千本（篇）（参见宋永毅、孙大进编撰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Bibliographical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8)。另一方面却是“被禁忌的文革”，即在中国大陆它还是一个犯禁的独立研究课题。然而，大陆的学者和作家们仍以回忆录、报告文学等等形式努力冲击着禁区。但是，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学者还是国际汉学界的文革研究都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其中很重要是原始的历史资料和系统性的整理工作的双重缺乏。文革中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出版物可谓浩如烟海，但文革后中国所有图书馆中的这类收藏都无法自由查阅。另一方面，收藏在民间和海内外学者手中的不少可贵资源又因为缺少一个资料信息的共享工程，无法发挥它们的最大作用。由此，海内外文革研究中由史料问题引发的史实的错讹，真相的曲解和研究的空白的仍普遍地存在，阻碍着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的发展。

正是从总结历史教训，揭示历史真相，推动文革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目的出发，北美地区来自中国大陆的近十位学者于1998年组成《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编辑部，开始了这一筚路蓝缕的浩大的史料编纂工程。他们是：宋永毅、石之瑜、丁抒、周原、沈志佳、郭建、周泽浩、王友琴。很快，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台湾、香港和大陆学者们的大力支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还成了合作单位之一。三年多来，编者们的走遍了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的私人收藏，抢救了无数第一手的文字资料，在数以百万计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进行专业性的编辑校勘，汇集成了这一光碟中的上万篇文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正准备出版这一光碟。

汇编在这一光碟中的史料，局限于第一手的文字资料。虽然也有一些文革后与文革密切相关的文献，但回忆录、访问记等等的二手材料均不在收录之列。就数量而言，已经有近三千万字之巨，共分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报”，“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讲话和文章”，“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首长讲话”，“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等七大部份。为了方便中外学者查阅，这一文库还采用了中英文两种编目。但内容因实在过于浩大，一时还无法译成英文。

如此巨大的史料容量，如果采用传统的印刷出版，可能有数百本之多，连存放都很不方便。而现代计算机技术却使它们能浓缩在一盘体积极小的光碟之中，而且还能够运用“作者”，“标题”，“时间”和“关键词”进行自由检索。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个光碟文库正借助于现代科技，在史料汇编方面完成了一个研究性和资料性并重的学术性的“文革博物馆”。

□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

【研究动态】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序

• 余英时 •

宋永毅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费了整整四年的功夫，历经种种艰辛，编成了这一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这部文库收集了一万篇以上的原始文件，总字数接近三千万，真不愧为一项“浩大的史料编纂工程。”《文库》以类相从，分成七个单元，所收的都是第一手资料，为将来研究“文革”的学人提供了最方便、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汇编。参加这项计划的八位学者，包括宋永毅先生在内，都是卓然有成的专才。他们各自在专业的岗位上，利用公余的时间，遍访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搜寻一切有关的文件；这一困苦的过程，只有“集腋成裘”的成语才能勉强形容其万一。英国著名史学家屈维林（G. M. Trevelyan）说过一句名言：“去收集法国大革命的事实吧！你一定要下至地狱，上至天堂，去把它们找回来。”（Collect the fa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You must go down to Hell and up to Heaven to fetch them.）无巧不成书，现在《文库》的八位编者竟在无意之间把这句名言实践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一任务上。宋永毅先生还真的下过一次地狱。我清楚地记得，几年前他为了收集资料，失去了几个月的自由，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国际事件。没有史料便根本不可能有史学，所以作为史学园地中的一个耕耘者，我必须在这里向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致以

最大的敬意。

我细读了《文库》的全部目录之后，好像重温了几十年前的一场噩梦。第五部份的报刊社论是我最熟悉的；这些文字当年是顺着发表的次序，一篇一篇读过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现在又整个地从记忆中陡然复苏了。我不过是“文革”的一个海外旁观者，情绪尚如此激荡，《文库》编者是曾经身历其境的人，他们在长期编纂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精神痛苦，更可想而知。这样看来，《文库》所收的一切文件决不能和一般所谓历史档案等量齐观，因为其中仍然跃动着强烈的生命。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每一个文件的后面都隐藏着数不尽的血和泪。我们不难想象，当年每一个文件发布的前后，有多少活生生的个人遭受到精神的屈辱和身体的摧残，更有多少本来很幸福的家庭顷刻之间变成“家破人亡”。研究《文库》中的文件，若不能接触到背后那些无数淹没在血河泪海中的生命，便不免空入宝山了。

宋永毅先生在〈总导言〉中指出了关于文革研究的一个奇特现象：即一方面是海外有“说不尽的文革”，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却是“被禁忌的文革”。1978年以后，中共官方事实上已完全否定了文革，我们只要一读《文库》第一部份“中央文件”最后十一年（1978—1988）的目录便已昭然若揭。但是在同一时期，我们又看到了许多关于文革研究的“禁忌”的规定。最明显的是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提醒全党维护毛主席形像的通知”，198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共为什么如此自相矛盾，一方面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维护文革呢？答案并不难找：1978年后，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班子都是被文革打倒的人，他们如果不否定文革，在党内便没有合法性了。但是文革的根源如果步步追究下去，到达其逻辑的终点，则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却又将成为问题了。“投鼠忌器”，这是中共不得不为文革研究设下许多限制的根本原因。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之所以得不到官方的任何回响，是丝毫不必奇怪的。

“被禁忌的文革”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怎样认识和研究文革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什么启示呢？我们决不能把文革孤立起来，看作是中共“革命”进程中一个偶然的“意外”或“偏差”。中共官方今天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便是有意误导我们的思路。文革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阶段。但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个绝对独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结局。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有系统地进行消灭所谓“敌人”的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正如俄国史名家派普思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师法列宁、斯大林，而且也参考了希特勒的经验。（见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1993, p. 281.）列宁在建立政权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9月，正式采用了“红色恐怖”（“Red Terror”）的统治方法。毛泽东一切照抄，也在1950年藉口“土改”和“镇反”，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红色恐怖”从此便笼罩着中国的大地。“文革”不过是最后一个高潮而已。《文库》第六部份收有红卫兵的一篇文献，题目是“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恰好证实了文革是“红色恐怖”的必然发展。

我们衷心地欢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问世，为革命暴力蹂躏中国，保存了最宝贵的记录。但是研究文革首先必须具备历史的眼光（“historical perspective”）：它的近源是1949年的巨劫奇变，远源则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文库》的价值才会充份地显现出来。

□ 2001年12月20日于普林斯顿
~~~~~

【研究动态】

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

近来，一些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和介绍“文革”历史、事件、人物的图书；一些出版社正在安排这方面的选题；还有些出版社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以所谓“文革”期间的“轶事”、“秘闻”、“内幕”之类的名目招徕读者，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就有关“文革”图书的出版问题指出：

根据中央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一贯精神及邓小平同志关于当前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政治优势的指示，目前争相出版《文革辞典》极易导致翻腾旧帐，引起争论，实无必要。对中央宣传部发过的《通知》置之不理，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批准的作法，不能接受。并重申中央过去的规定，指出出版此类书可能引起的反效应，因此，相当时期内根本不考虑出《文革辞典》的申请。

为此，对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规定如下：

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辞典等工具书，今后相当时期内，各出版社均不得安排。已安排了的（包括在印制过程中的），凡未经过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专门批准的，一律撤销，并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

二、凡属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及专门叙述“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著作，一般不要安排，确有价值的选题，地方出版社要专题报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宣传部，中央级出版社专题报上级主管部（委），经严格审查同意后，写出书面审查意见，报新闻出版署并中宣部审批。

三、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传记、纪实文学作品等，前一段时间已出版了不少，原则上不要再安排。那种捕风捉影、肆意虚构、夸大史实，以林彪、“四人帮”的所谓“野史”、“秘闻”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不得再出版。确有一定价值、严肃认真的回忆录，地方出版社专题报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宣传部，中央级出版社专题报上级主管部（委），经审查同意后，写出书面审查意见，报新闻出版署并中宣部审批同意后方可组织出版。这些回忆录必须事实准确，不得违背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不得随意使用中央未正式公开的历史材料，不得随意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个人品德问题。

四、上述准予出版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图书，目前限由各地人民出版社及有关的中央级社会科学出版社安排出版，其他出版社均不得安排。这些书一律不得以协作出书和代印代发的方式出版。

五、上述图书的发行全部交新华书店，不得交由个体、集体书摊（店）批发。

六、翻译国外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图书，一律按上述规定执行。

七、凡未经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批准的目前正在安排、印制有关“文化大革命”图书的出版社，接到本通知后，一律暂停印发这类图书，同时将选题和图书安排情况报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听候处理。

八、本规定自文到之日起执行。凡违反上述规定的，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包括没收利润、罚款、追究领导责任等处罚。处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决定，必要时由新闻出版署决定。

九、过去规定凡有与本规定不符者，按本规定执行。

□ 颁发机构：中宣部 / 新闻出版署，颁发日期： 1 9 8 8 年 1 2 月 1 0 日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wx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